

張學良口述歷史謎中謎

● 王逸之

訪談破解部分謎團

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於一九九〇年（民國七十九年）復活節，也是張八十九歲生日那天，在張的好友，前立法委員王新衡兒子王一方的家裡，應郭冠英的請求做了一場口述歷史訪談，在場的還有史學家唐德剛教授。這一訪談紀錄，塵封了十一年，直到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，張學良在檀香山病逝後，才在當月二十八日的某報上披露，由於訪談的事蹟敏感，立刻引起海內外廣泛的注意。

在這篇訪談中，的確澄清了西安事變長久以來的部分謎團，還原了歷史真相，尤其替蔣介石洗刷曾命令張學良對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傳聞，使蔣蒙受的不自之冤，得到昭雪。但對某些關鍵問題，如張與

中共的密謀等等，仍然避重就輕，語多保留，諱莫如深。反而另外製造出新的謎團，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探討。

訪談內容不夠嚴謹，只可視作張學良的即興之談。畢竟當時他已是八十九歲的老人了！或許是郭、唐兩位不忍提出太尖銳的問題，令張太難堪吧！

不抵抗責任的歸屬

西安事變發生以後，中共代表周恩來到西安，向張學良提出停止內戰的相關承諾，並請張向蔣介石代達。張即表示同意。周對張說：「把陝北這個地方仍給我們，讓我們後方的眷屬居住；另外，不要把我们共產黨消滅，其餘，一切服從中央，軍隊也交給中央改編（註一）。」對周恩來所提的條件，蔣介石幾乎沒有理由不接

受；既能實現他剿共目的，又可全身而退，不啻打了一場大勝仗。蔣遭劫持後，從來不曾向張的威勢屈服，也未接受任何喪權辱格的城下之盟。從蔣的堅毅沉穩、威武不屈、不受要挾種種表現，似乎找不出什麼敗筆！

一九三〇年，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，因東北軍不抵抗，日軍兵不血刃，輕易地攻佔了東三省。張學良頓時成眾矢之的，備受國人責難，最具代表性與膾炙人口的，莫如馬君武的兩首詩了。一是：「趙四風流朱五狂，翩翩胡蝶最當行；美人富是英雄塚，那管東師入瀋陽。」另一是：「告急軍書夜半來，開場弦管又相催；瀋陽已陷林回顧，更抱佳人舞一回。」觸眾怒的張學良意興闌珊，又染上毒癮，生活糜爛墮落，後來到上海戒毒成功

，再出國去歐洲避風頭，風波才暫時緩下來。於是別具用心的人，刻意製造與事實完全相反的說法，廣為流傳，妄圖嫁禍蔣介石，達到眾口鑠金，混淆黑白的目的，把張的不抵抗，硬說成是蔣的授意。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，應負責的人是蔣而不是張，張只是代人受過，替蔣背黑鍋而已。蔣為此一度暫短下台。甚至還把馬君武的諷刺詩說成是謗詩了。

在訪談中，張學良以夫子自道的方式，說出事變的秘辛與責任歸屬。張說：「我的責任就是我的責任，例如九一八不抵抗不是政府要求的，明知打不過人家，當然不打，這是我的責任，我就是這樣。」張的話，固然破解了謎團，也顯現出蔣的忍辱負重與張不推責的大丈夫本色。

蔣張與中共恩怨錄

張學良少年得志，靠其父老師張作霖的庇護，十七歲就當上團長，二十七歲官拜上將軍團長，人稱少帥，名傳全國，算得上平步青雲。張學良多少也遺傳了老師剛毅豪邁的綠林性格，說他是草莽英雄、純袴公子也不為過。學者余英時在「張學良的政治世界」一文中（註二），道出張

的文化系統，居於「俠」的傳統。筆者到認為「俠」只能表現出張的行事風範，他內心所遵循與執著的，卻是個「義」字。張一生大開大闢，恩怨分明，但把「俠義」兩個字用到波詭雲譎、翻雲覆雨的政治上，就顯得格外不足了。

張學良一生只佩服兩個人，一個是他父親；一個是蔣介石。他也只有兩個長官，也是他父親和蔣介石。他批評其父有雄才無大略，批評蔣介石有大略無雄才。張單獨對蔣也有很多負面批評，說蔣是個非常守舊的人，用人疑人，先後派錢大鈞、晏道剛當他的參謀長，是在監視他。一九二八年東北易幟，他幫助蔣完成北伐統一大業；一九三〇年，閻錫山、馮玉祥聯合反蔣，爆發中原大戰，他再度支持蔣，促成閻、馮潰敗。張學良對於蔣的革命建國，在緊要關頭，總能踢出決定性的臨門一腳。蔣對張也是曲予迴護，屢次寄膺方面重任，先後在華北、華中、西北方面，責成張代表他全權負責。後來竟因為「先安內後攘外」與「先攘外後安內」的政見發生歧見，而結下心結，才導致分道揚鑣，各走極端！

張學良因贊同中共標榜的「停止內戰

聯合抗日」的政治訴求，逐漸同情中共，後來轉而尋求與中共結盟。在事變發生之前，張曾兩次與中共領導人密會，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的洛川會議，第二次是同年四月九日的延安會議，更在當年的九月二十二日，由張代表東北軍與紅軍（註三）代表簽訂抗日救國協定，贊同成立中華民國共和國，組織國防政府（註四）。張還不惜用大批軍需物資，及武器彈藥支助紅軍。根據傳聞，張學良曾向中共要求加入共產黨而遭中共婉拒！

在中國現代人物中，張學良最佩服周恩來。他說：「我佩服他，他也佩服我，可以說我倆一見如故。」張回憶初見周恩來的印象，說：「這個人，我一見面，他一句話把我刺透了。」周對張學良說：「如果你可以坐轎，我們共產黨可以放棄了所有的事情。我們很希望也更願意你能來領導我們。」周到底老謀深算，唱做俱佳，不愧是爐火純青的談判高手，一下子就突破張的心防，在精神上先把張給俘虜了。在五十多年以後，張學良回憶著說：「也許我上了周恩來的當也不一定？」從張的口述看來，硬要說中共沒有參與過西安事變的預謀，甚至事前對事變完全不知

情，恐怕難以讓人信服！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蔣介石終於被釋，

形武力與秘密組織，幾乎都喪失運作機制與發展空間。

在東北軍、十七路軍、紅軍三股勢力中，以東北軍的人數最多，實力也最強，三方面的結盟，該由張來主盟才對。但自從周恩來到西安後，便盡情地發揮他那長袖善舞與縱橫捭闔的長才，儼然成為三方面的盟主，搶盡了張學良的光環，恐怕是年輕氣盛的張學良最不能接受的吧！張向全國各界通電，提出他與楊虎城的八項政治訴求（註五），希望能為事變的合理性尋求廣泛的共識與支持。結果不僅得不到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握有兵權實力派的響應，就連學術界具指標性代表人物如胡適等，也都給他猛澆冷水，

就在蔣登機後即將起飛的那一剎那，張學良跟著跳上飛機，送蔣回京，束身待罪。張那時的心境，無人能理解？他是否認為西安事變已經圓滿落幕了，他要為以下犯上、劫持統帥、不容於軍紀的魯莽行徑向蔣負責？還是對中共的中途變卦表示抗議？或是他的草莽性格——好漢做事好漢當的英雄本色一時發酵？

逼出來的西安事變

招來舉國上下交相撻伐！而蔣介石在遭劫持後，聲望不降反升，人氣指數高達百分之九十六（註六）。就在張學良深陷孤立，最需要奧援的時候，中共受到來自莫斯科方面的壓力，改弦更張，轉而主張釋蔣！甚至連與他結為生命共同體楊虎城的十七路軍，也不斷和東北軍發生磨擦，而東北軍內的少壯派，越發的氣焰高漲，頻頻向他施壓。張學良陷入了進退維谷，騎虎難下的窘境！在他的內心深處，何嘗沒有受欺騙與被出賣的感受呢？

盤踞在贛南與鄂東兩處的共軍，經國軍五次圍剿後，最後的基地陷落。於一九三五年，突圍成功，分途流竄。中共號稱二萬五千里長征，美其名北上抗日。用來掩飾挫敗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，共軍退到陝北的環縣、曲子、鹽池、定遠一帶，受到國軍的重重包圍，東面為湯恩伯部、南面為王以哲部、中央為胡宗南部，僅北面臨長城塞外，處境危如壘卵。八月二十日，中共向共產國際告急，在電文中說：「蔣軍已逼近定遠、鹽池，定、鹽一失，我軍主力在現地難以作戰（註七）。」在平、津、滬上等地所謂白區的地下組織，也紛紛地遭到戴笠的特務破壞，無論有

國軍的兵力結構，以東北軍為主，約二十餘萬人；十七路軍約四萬餘人；胡宗南、湯恩伯兩部合約五、六萬人；紅軍僅約兩萬餘人，雙方為三十萬對兩萬的比例，國軍居於壓倒性優勢，幾乎穩操勝券。中共擅長宣傳造勢，能在危機存亡之秋，打出一「停止內戰，聯合抗日」與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抗日軍不打抗日軍」的牌，用動人而又響亮的口號，深深地打動東北軍的心坎。而實際上，政府當時的政策，也並不曾被全民唾棄（從蔣受到極高民意的支持度，可看出），頂多只能怪政府顛預無能，拙於向民眾宣導溝通，政策才被扭曲誤解。蔣、張之間，對剿共問題上的認知，也有極大的矛盾與扞格，由於喪失互信，猜忌加深，終於釀成一發難收震驚中外石破天驚的重大事變！使蔣所精心設計的堂堂之陣、正正之旗的第六次圍剿，落得個偃旗息鼓，功虧一簣！孫子說：「敵雖眾，可使無鬥。」中共真把孫子的戰爭思想，發揮到了極致了。

東北軍進入西北剿共，因進展過速，一〇九與一一〇兩師，受到重大失敗，幾

乎全軍盡墨，師長何之中、朱元峰、參謀長裴煥彩殉職。張學良向中央請求給予特卹，為兩位陣亡師長的家屬各請發十萬元撫卹金，另外請中央補充兵員，恢復兩師戰力。所得到的答覆，卻是「礙難照准。」連兩師的番號也被撤銷。這讓張學良怎能接受！或許這就是西安事變最大的引爆點？正如張學良說的：「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！」

蔣介石向來把張學良與東北軍作分別對待。蔣對張好，無庸置疑。張說：「他很關懷我，特愛護我。」張晚年還戲謔稱蔣是他的「白粉知己」。蔣死後，張寫了一副「關懷之殷，情同骨肉；政見之爭，宛如仇讎」對聯，道盡對蔣的複雜心結。但蔣對東北軍卻有很深的偏見，把東北軍當作雜牌軍，視同軍閥餘孽。東北軍對中央的命令從來陽奉陰違，沒有認真執行過。九一八事變，東北軍不加抵抗。後來在遠離日軍幾千里外的西北，卻把抗日叫得震天響！也是蔣不能理解的！蔣把東北軍調到西北剿共，何嘗不是消滅雜牌、排除異己、一石兩鳥手段！張學良深知東北軍是他的包袱。張說：「東北軍是我的包袱，是脫不掉的包袱。到最後還是背著這個包袱。」張也曾想丟掉這個包袱。一

九三四年，張從歐洲回國後，汪精衛建議他去出任京滬衛戍總司令，張也向蔣表達願意出任，但蔣卻不同意，硬派他代表蔣坐鎮西安，指揮剿共，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宿命的悲劇！

蔣經國炮製新謎團

一九五五年，蔣介石要寫「蘇俄在中國」。怕把當年西安事變的事情記錯了，有一天，把張學良叫到大溪，蔣對張說：「他們（指中共）那邊的事情我不清楚，你何不把它寫下來。」張寫好了之後，被蔣經國先拿走了。張說：「後來又寫了，不知是誰來的，大概是王昇也不一定，反正經國把那信改了，信頭砍了，把它摺掉了，要我拿回來重新寫，我給他寫過。：他拿回去就發給蔣領看。」

蔣介石對於張寫的內容，最令他訝異的，是中共在事先不知道張發動西安事變？蔣還為此大大地發了一頓脾氣！

很顯然地，蔣介石看到的，不是張學良原先寫的內容，而是經過蔣經國刪改後重抄的。也是按照蔣經國的意思寫的。蔣介石想也知道，有著極大的落差！

當時蔣經國還未奉命與張學良聯繫，

後來才受命聯繫，建立了兩人的友誼。張學良說他與經國很好的，他們無話不談。

蔣經國對待張學良的方式，是極端的蔑視與不尊重，反映出「一個長期受監管形同囚犯的人，不能自主的悲哀！」張卻說和經國極好！在不平等的基礎上，張所謂的極好的友誼，不知是如何培養與建立的？

蔣經國是否別具用心？令人不能無疑，其身分與背景太敏感了！在蔣經國遠赴蘇聯進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之前，傳說他已是貨真價實兩年以上黨齡的共產黨員了（註八）！尤其後來蔣經國公開他的身世之謎後，更讓人對蔣經國處理這件事的動機與手段起了疑竇？蔣經國的做法，是否意味著想把盤根錯節、錯綜複雜、充滿政治權謀的西安事變，定位成單純的兵諫。替中共撇清關係？並讓看過懺悔錄（註九）的人在認知上建立某種先入為主的錯覺。

即使蔣介石對張學良所寫的不滿意，要他重寫，製造出來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，使事實真相更加模糊？替中共預留下與創造出更大的辯解空間呢？對此張學良只一語輕輕帶過，留下許多令人費解的謎團。

兩岸對立僵局難解

兩岸對立僵局難解

西安事變使中共從危機變轉機，成為後來擊敗國軍取得政權的轉捩點。它的確促成國、共兩黨第二次合作，一度締造暫短的和諧氣氛與落實雙方部分承諾，但卻沒能維持多久，留下來的問題，也沒有解決。隨著抗日的情勢轉變，雙方衍生的小規模衝突，從來不曾間斷過。抗戰勝利後，終於爆發全面內戰。一九四八年，東北、華北、徐蚌各地發生會戰，國軍相繼失敗，跟著起了連鎖效應，到了一九四九年底，逞現一片土崩瓦解之勢，政府被迫撤退台灣。

從此，兩岸分治，開始了「楚河漢界」的對峙局面，其間發生過古寧頭、登步島、大二擔、八二三等或大或小的戰役，國軍都能在敗中求勝，甚而得到全勝，才使台灣在這極不相稱的殘局中偏安下來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台灣勵精圖治，埋首經建，經濟早已起飛；中共改革開放後，逐漸也把大陸建設成為亞洲經濟與軍事上的強權。兩岸意識形態作祟，各走極端，政治整合從未出現過轉機。台灣的幅域小得和大陸難成比例，長久僵持下去，未必對台灣有利！

兩千多年前，中國的哲學家孟子，就

對大國與小國互相因應的生存之道，作了極高明的詮釋。他說：「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，有天下；畏天者，保其國。」樂天指效法天道的樂生之德，使萬物各安所生，欣欣向榮，也是易經上說的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」畏天是畏天之威，像風、雨、雷、電等的天象變化，都威力無限；秋冬季節，天地間充滿著肅殺之氣，使萬物枯萎凋謝。這種自然現象值得兩岸的主政者深思與效法的。

張學良既不願死後埋骨台灣，儘管台灣當局給予褒揚，贊揚他在西安事變前的種種功勳；也不想落葉歸根，歸葬故土，空讓大陸當局歌頌他是千古功臣、民族英雄！卻托骨異域寧願長留檀島！他的心境，箇中的原因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也跟著他長埋了。

註一：凡括號內引用的文字，都是引用張學良訪談中的話。

註二：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聯合報。

註三：當時共軍稱為紅軍。抗戰時接受軍委會改編，先後被賦予八路軍與十八集團軍番號；在華中、華南與東南一帶游擊隊也被改編成新四軍。

八集團軍番號；在華中、華南與東南一帶游擊隊也被改編成新四軍。

擴大內戰後，中共取消以上番號，統稱人民解放軍。

註四：丁中江「張學良傳奇一生」九十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，聯合報。

註五：張、楊通電全國八項主張：

1. 改組現在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人士共同負責救國；
2. 停止一切內戰；
3. 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；
4.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；
5. 解放民眾愛國運動；
6.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；
7.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；
8.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。

註六、註七：同註四。

註八：周谷「蔣經國三十年在莫斯科受審

一文，述及蔣的共黨身分，為：

「蔣經國在一九二五年初在奉化老家曾參加中共第五支部（含奉、錦溪兩地）活動，其領導人為周天修。蔣經國留學莫斯科係奉中共黨部，走後門入校。」

註九：張學良寫的資料，被蔣經國冠以懺悔錄發表。同註四。